

第一章 导论

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尤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学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经济增长要实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配套。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始于 1939 年哈罗德发表的《论动态理论》一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一是当时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增长，二是广大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排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分后的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部分是值得我国借鉴的，但要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本书主要是研究实现中国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政策配套问题。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一、经济增长的概念与衡量指标

(一) 经济增长的概念。

对于经济增长的概念中外学者还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夏皮罗强调产量的增加，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最简单地规定为经济的产量的增加”〔美〕夏皮罗著：《宏观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45 页。格林沃尔德强调生产能力的增长，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内商品和劳务的增长相结合的其生产能力的增长”〔美〕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48 页。雍文远同志强调社会必要产品

的增长，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是指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总的和按人口平均的社会必要产品有计划的一个过程”（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2 页）。田江海研究员认为经济增长不但是一种量的增长，而且是一种质的增长，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李泽中主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版，第 203 页）。经济增长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实力和运行状况，以及民族生存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的现实条件和蕴含的潜力。经济增长不仅应该表现在量上，而且应该表现在质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应吸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教训，追求质量型的集约型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是指在量和质上的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不但要在量上提高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且要在质上改善和提高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构，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

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是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指经济社会（即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的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市场价值的概念，凡不进入市场交换的产品和劳务均不计入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只计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不计中间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国民生产总值也只计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所卖掉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流量，不是一个存量，反映的是变量在一段时期内的变化量。国民收入可以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得到，它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折旧、间接税、企业转移支付和政府补助金。通过生产法、支出法

和收入法可以计算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由于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反映人口的多少，所以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

1985 年前我国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是指一国在一定的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价值的总和。由于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物资生产部门，所以其产值的大小大致能反映国民经济的状况，但工农业总产值不但没有包括全部物资生产部门，而且没有包括劳务部门所生产的价值。社会总产值除包括工农业总产值以外，还包括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产值的总和。它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五大物资部门的产值，较之工农业总产值更具有全面性，因而长期以来成为衡量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综合指标。国民收入是物资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的时期内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它不包括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和重复计算的因素，能够比较确切地反映一国物资生产部门的经济增长情况。我国的这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称为物质产品平衡体系。这套核算体系是与我国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核算体系的缺陷日益突出。一是不能反映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情况，而劳务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产业也是国民经济日益重要的一个部门；二是不能系统地反映社会资金运动情况，不便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三是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循环全貌及各环节间衔接情况，同国家掌握整个经济运行和整体平衡要求不相适应。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全面反映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为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并正确地进行国际比较，从 1983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进行试算国民生产总值，1985 年起，我国开始正式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考核国民经济发展和制订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主要指标。在党的十二大，我国是用工农业总产值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指标；在党的十三大，我国三步走的战略规划是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宏伟的战略

目标的。

其实，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于社会总产值指标有很多完善的地方，但并非完美无缺。其缺陷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真正的生活水平，例如闲暇、劳动紧张、收入分配和环境污染等；二是不能反映产品和劳务的进步；三是不能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的结构；四是非市场交易活动得不到反映，一国的自然经济比重越大，则这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越低；五是统计中有一定的误差，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许多数据是根据抽样得出来的，其中本来就包含了一定的误差。鉴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局限性，1972 年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和托宾对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进行了校正，具体为应当加上闲暇，应当加上主妇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应当减去为消除污染所付出的代价，应当减去现代城市生活造成的其他损失。这些观点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二、经济发展的概念与衡量指标

（一）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发展是指一国或一地区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出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在内的各种结构的协调和发展。经济增长只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经济发展不但包括了经济增长的内容，而且包括了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合理化。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认为经济发展至少包含了下面三个重要变化：一是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上升，二是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的上升，三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自己动手加入经济发展的过程，成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参予者（帕金斯等著：《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版，第 15 页）。所以经济发展不但包含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而且包含了政治结构的改善和社会与个人福利的增进，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社会和个人福利的增进。

（二）经济发展的衡量。

帕金斯的三个变化的观点实质上也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三个指标,但他主要是强调了经济结构的变化。除开政治的因素,社会和个人的福利的增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以此为依据,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以用下面的指标加以衡量 第一,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 第二,收入与分配的均等程度 第三,识字率 第四,健康水平 第五,就业状况。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提出了用 16 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即每个房间人数、人均报纸发行量、人均能源消耗量、人均钢消费量、预期寿命、蛋白消费量、小学入学率、高小入学率、职业学校入学率、农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口百分比、公用事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口百分比、经济活动中的工资和薪水收入百分比、国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男性劳动力的人均农产量、人均出口量和城市人口百分比等。联合国社会所的 16 个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变化和个人福利等多个方面。

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被不断地满足即为社会和个人福利的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的不断增进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而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又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理论的社会主义本质,所以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又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一致的。

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如前所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衡量两者的指标也不一样。但二者是相互关系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没有经济增长,则不但没有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增加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且没有社会和个人的福利的增进。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不是为经济增长而增长,而是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和个人的最大

福利。本书的经济增长包括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所以在本书中经济增长是经济政策目标的第一位的目标。

第二节 集约型经济增长

1995 年 9 月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 2010 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不但要实现经济增长,而且要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

一、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

粗放型与集约型的划分最早来自农业领域。粗放型农业是指在劳动和资金一定的条件下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增加农产品的产量;集约农业是指在同一块耕地上增加资金和劳动的投入而增加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中对两种级差地租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析。粗放耕作,是资本家投入一定的资本,去耕作“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作”(《资本论》第 3 卷,第 756 页)的土地;集约耕作,是资本家把一定量的资本,投入到原来已经耕种过的土地上;实行耕种集约化(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资本论》第 3 卷,第 760 页)。其实,马克思对外延扩大再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也就是对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研究;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考察即为对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在马克思《资本论》英文中粗放和外延是同一个单词,为 extensive 集约和内含是同一个英文单词,即为 intensive。所以,粗放

型经济增长是指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实现的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粗放型经济增长而言的，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而实现的一种经济增长。从以上的定义中可得到：判断粗放与集约的标准不是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也不是生产要素的数量是否增加，而是投入与产出的比例的变化，只有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即在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同时，只要有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使是一点点，也是集约型经济增长；也就是粗放型经济增长不仅是投入增加，也不仅是以投入增加为主，而且是单纯或完全依靠增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不仅可以增加投入，而且可以大量增加投入，但投入要素一定要有效率的提高，即使只有一点点。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中有规模报酬问题的研究，这些理论是值得我国的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理论借鉴。规模报酬递增即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所谓规模报酬递增是指产量的增加比例大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规模报酬不变与规模报酬递减均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所谓规模报酬不变即为产量的增加比例与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相等，所谓规模报酬递减是指产量的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粗放与集约的经济增长也可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进行划分。宏观粗放型经济增长也叫单纯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是指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和重复建设等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宏观集约型经济增长是指主要依靠产品质量、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但要实现微观的集约型经济增长，而且要实现宏观的集约型经济增长。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正确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含义。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是指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增长。“主要”的含义是指经济增长的贡献的 50%（包括 50%）

以上是由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衡量生产要素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增加率大于所有要素增加率的一个余额,比如全要素的增长率为 2%,而产出的增长率为 4%,经济增长存在一个剩余,这个剩余就是 2%的全要素生产率,此时经济增长的 50%是由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小于 50%,则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小于 50%但处于不断的上升,则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以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但正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国正处于这一过程当中,应大力推进这一转变。

(二) 正确理解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关系。

1. 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两者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在空间上具有并存性。

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开始的。英国的经济增长是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开始的,原始积累不但是英国工业资本家资本的积累,而且是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力的积累。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从轻纺工业开始的,这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标志之一,因为轻纺工业具有投资少、周转快和效益高等特点。我国的经济增长也不得不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开始。解放初期,我国的工业经济体系很不健全,当时只有通过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的数量扩张才能促进我国经济体系的快速建立和发展。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源有限性的日益暴露,一国和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必然发展到追求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一般说来,粗放型经济增长出现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此时的劳动资料积累有限、科学技术的水平也不是很高,不过没有开发的自然资源和生领域较多。但随着资本的集中和积聚、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程度的提高,能够利用开发的

自然资源和生领域是越来越少，经济增长方式就必然从大量消耗资源为主的粗放型转向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集约型，社会生产力也就随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真正达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则是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生产要素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不断地以集约型增长为主的过程。经济资源的有效性与人类的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既导致了经济学的产生，又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两种增长方式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在空间上具有并存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地追求技术进步的过程。

2. 粗放型经济增长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前提与基础。

集约型经济增长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下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精辟分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分析了二者的关系。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不是简单再生产，更不是缩小再生产，而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只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西方经济学叫资本的宽化）而引起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这种扩大再生产并未使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增加（西方经济学叫资本的深化），从而并未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资本论》第 1 卷，第 694 页）。但是这种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基础”（《资本论》第 1 卷，第 685 页）。而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内容的扩大再生产正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即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所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3.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非不要粗放型经济增长，只是以集

约型经济增长为主。

我国的经济增长仍需要粗放型经济增长。一是因为我国的短缺和瓶颈部门仍需要有大的项目的上马；二是要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需大力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这需要有新的摊子。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概念上说也需要粗放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是指产出的增长率大于投入要素的增长率，没有要素的投入是不可能产出增长率的。所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真正含义在于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而不是不要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第三节 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实现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分析

前面主要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划分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其实这种理解还是比较狭窄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生产力因素以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人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划分为体制推动、政策推动和科技推动。虽然这三个因素分别代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力，这三种因素确实也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概括是不全面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经济增长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三大系统的内部各因素和系统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生产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决定力量。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力，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所以，经济增长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政治、政策、文化和法律等等方面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会对经济发展、科技、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力系统的因素是科学技术、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组织等。其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是生产力

中最活跃的因素。马克思分析了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五个因素，即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交通、自然条件等（《资本论》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和分工的作用：“我们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因此，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资本论》第1卷，第423—424页）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第3卷第97页）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产权关系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关系的基础，经济体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的产权关系的基础应该是要素资产联合与劳动者（包括经营者）联合体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现代企业制度，构造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是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目标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我国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是我国集约型经济增长实现的重点。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高速的稳定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只有在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套。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呈指数化的发展，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关键，比较中日产业政策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

二、集约的效益速度型经济增长

我国作为低收入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增长目标始终是我国经济政策的第一位的目标。我主张我国应始终不渝地坚持“赶超”战略，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近 3 万美元，而我国目前仍在 600 美元左右，是我国的 50 倍。我国的底子薄、基数小，只有保持较高的速度才能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资本主义国家真正发展速度较快的时代也主要只是在本世纪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我国的工业化虽始于 50 年代，但真正的高速发展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 20 年正好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时候，这扩大了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从 1980 年到 1995 年我国的实际 GNP 已翻了将近二番，即经济增长了三倍多。1979—1991 年我国 GNP 的增长速度是 9%，1991—1995 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 12%。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我国肯定可以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能否长期保持如此高的速度呢？只有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才能长期地保持高速度，这种速度型的经济增长，我们称之为效益速度型经济增长。

我国“九五”计划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是 8%，比“八五”降低了 4 个百分点。根据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的估计，如果中国在未来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8%，而上中等收入国家保持在 4%，我国可以在 49 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的水平，即我国的人均 GNP 由 1993 年的 490 美元增长到 2042 年的 14653.8 美元，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 GNP 由 1993 年的 4370 美元增长到 2042 年的 14653.8 美元。根据别国和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这么高速度还是有可能达到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在过去的 40 年就一直保持了 8% 以上的高速度。但据估计它们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源泉是生产要素效率的不断提高。按当年价格计算，从

1981 年到 1992 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14.69%，而同期全社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增长率则达 20.67% 与之相比，我国台湾省从 1952 年至 1988 年按当年价格的人均 GNP 的年均增长率为 14.59%，而同期的固定资产形成的年均增长率为 16.33%。

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是实现效益速度型经济增长的关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观点可以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1994 年 11—12 月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西方经济学家把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看作一种奇迹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亚洲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增加而实现的一种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只能保持暂时的高速度，但最终会要放慢下来，甚至会出现经济的停滞，因为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出现投入报酬的递减。他以前苏联为例，50 年代和 60 年代，苏联的经济发展很快，大大超过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当时有人又预言，苏联不久将会超过西方。但苏联的经济最终停滞下来了，原因是苏联的经济增长是通过大规模调动国内资源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当前消费和闲暇而获得的经济高速增长。虽然东亚经济不同于前苏联经济，我不同意克鲁格曼对东亚，“纸老虎”经济的评价，但他的观点也从一个方面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只有技术进步的发展，才能使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不递减。

我国在经济增长的规划上一直强调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982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翻二番的战略目标，即“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1987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步走战略，同时也强调指出，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

三、稳定的集约型经济增长

我国不但要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要追求稳定的经济增长。经济稳定主要是针对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而言的。所谓稳定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是指波动比较小和通货膨胀比较低的一种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经济周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我们不能消灭经济周期，但可以减少经济周期的危害，即缩短经济周期的时间、减少经济周期的振幅。通货膨胀虽然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完全地避免通货膨胀也是比较困难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不断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增加企业的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可以使企业在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不断降低的条件下增加对生产要素的使用，从而扩大生产要素的使用，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在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一个时期的经济潜力的损失都是不可弥补的。如果某一体制由于周期性不稳定，在各个时点上都未能发挥它的潜力，那就无法实现它在整个时期内的可能增长。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期内是可以实现稳定增长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所能达到的均衡总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因此经常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但政府只要主要利用财政政策调节总需求，就可以缓和危机并使整个经济活动达到充分就业。凯恩斯的分析未考虑时间的变化，他把人口数量、资本数量和技术条件都看成是既定不变的。凯恩斯没有把经济活动如实地看成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活动，从而对于经济活动在达到均衡状态以后的进一步稳定增长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凯恩斯的稳定只是一种短期的稳定增长。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认为经济不可能获得稳定的增长。哈罗德认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经济的实际增长率等于企业家感到满意的增长率，也等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哈罗德认为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三个增长率都相等是非常困难的，从而经济沿着均衡的途径稳定增长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储蓄倾向一定的条件下，三种经济增长率分别取决于实际的资本产量比、企业家所希望的资本产量比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而这三个变量又是由各不相干的若干因素决定的，所以三者相等的可能性极小；并且由于企业家预期和其他心理因素的作用等影响会导致一旦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发生偏差，经济活动不仅不能自我纠正，而且会产生更大的偏离。这个结论就是哈罗德的“不稳定原理”。所以哈罗德认为经济只能在剧烈的波动中实现增长。

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哈罗德的结论过于悲观，而且也与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一些西方学者在 50 年代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以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最为有名。索洛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就长期来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无论最初的资本—劳动的比率如何，经济活动总是趋向于一条均衡的经济增长途径。当人均资本小于均衡增长的人均资本时，即当人均资本增量（又称为资本的深化）大于 0 时，会出现资本的增长率大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从而会提高人均资本，最后会达到均衡增长的人均资本。当人均资本大于均衡增长的人均资本时，即当人均资本的增加量为负数时，会出现资本的增长率小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从而会降低人均资本，最后达到经济均衡增长所要求的人均资本。在均衡增长点，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都是不变的，总产量是随着劳动力的变化率而变化的，从而产量的增长率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索洛模型与哈罗德模型的差别在于两者的假设条件不一样。前者认为资本与劳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后者认为资本与劳动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在索洛模型中，由于资本与劳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所以人均储蓄最终会等于资本的广化。

我国已具备经济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第一，高储蓄率和高

投资率的存在。从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看，1988 年仅为 0.074，1991 年上升为 0.151，1994 年又进一步上升为 0.195；从城乡居民储蓄余额，1984—1988 年平均增加额为 582 亿元，1989—1993 年平均增加额为 3800 亿元，而 1994 年为 6315 亿元，1995 年为 8126 亿元，1996 年底我国的城乡居民的储蓄余额约为 3.8 万亿元。在整个 80 年代，我国国内总储蓄率一般年份维持在 33—34% 左右，其中的最高年份 1987 年为 41.7%，1993 年又上升到 42.7%。根据世界银行 1994 年统计，目前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 40% 的国家只有新加坡，1992 年达 57%，如此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目前已高居世界第二位。我国 1984 年、1988 年、1992 年、1994 年的投资率分别为 26.5%、32.0%、32.7%、36.4%，而按照一般的估计只要 30% 左右的投资率就可维持 7—8% 的增长率，可见我国目前已是高投资率。第二，金融剩余的大量存在。从国家信贷收支看，1985 为贷差 660 亿元，1988 年贷差 620 亿元，而 1992—1995 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却连续出现存差，1992 年为 420 亿元，1994 年已达 956 亿元，而且从 1994 年开始整个银行体系在改革以来首次出现存差，当年达 4052 亿元，1995 年达 2909 亿元。从国际收支平衡看，1989 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只为 55.5 亿美元，1991 年、1994 年、1995 年分别为 217 亿美元、517 亿美元、723 亿美元，1996 年已超过 1000 亿美元。

我国已具备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第一，我国有强大的政府，公有制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国家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的建立和完善。第三，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正在不断地上升。第四，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加大。技术进步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后起国的优势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加速这一进程。第五，随着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国民素质已在不断地提高。

四、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关键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关键是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有：

第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指通过技术改造、革新、新技术应用和技术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来提高生产要素使用的效率。一般来说，生产过程从劳动或资本密集向技术密集的转化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发生，这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知识的积累又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关键。所谓技术知识是指关于物品的具体性质和如何地制造、组合和使用它们的知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越来越大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估计，1929—1969年知识的进展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率为25.8%，1948—1969年上升到30.9%。目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60—70%之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管理水平的提高。丹尼森非常强调管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认为管理知识就是管理技术和企业组织方面的知识。在他看来，管理和组织知识的进步更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国民收入。甚至他认为管理知识比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重大。管理的改善要充分地发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改革企业管理方式，调整管理的组织结构，提高管理者本身和被管理的人财物的利用效率。

第三，体制推动。一种企业制度如果比另一种企业制度更自由，对市场主体具有更明显更直接的经济利益推动，同时有更强的成本约束和预算约束，那么在这种企业制度下经济主体和其他经济组织就更有效率。不同的经济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有不同的效率。从实际结果看，市场经济体制配置资源的效率高于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观点，“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